关于慈善义演研究与文献整理的思考

周 秋 光

学界研究慈善，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那时研究慈善还是禁区。而如今，研究慈善成为热门，至少有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法学五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加入了研究者队伍。慈善史研究历程 30 年，慈善义演作为研究分支是从郭常英开始，我见证了郭常英教授自 2013 年发表见解，并为开拓这个新领域所作的艰辛努力。本文从慈善义演研究现状梳理、问题辨析和思考建议谈点看法和建议。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目前学界慈善义演研究还处于起步状态。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有四个方面：一是“慈善义演”的定义；二是慈善义演兴起的原因；三是慈善义演的功能；四是慈善义演的作用和影响。

对相应的学术观点归纳如下：

1.在定义方面：第一，中国近代义演是知识分子和慈善组织利用戏剧艺术的形式来进行公益募捐，以唤起民众的爱国情操和公益心（胡娟：《中国近代慈善义演》，《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 年第 3 期）；第二，慈善义演“主要是通过演艺筹集资金用于社会慈善活动”（郭常英、岳鹏星：《寓善于乐：清末都市中的慈善义演》，《史学月刊》2015 年第 12 期。张秀丽、岳鹏星：《剧资兴学：清末京津地区慈善义演的发源》，《音乐传播》2017 年第 1 期）；第三，“慈善义演是一种为了慈善进行演出而不收取报酬或通过演出筹集资金用于社会慈善活动的社会公益行为”（李爱勇、岳鹏星：《演戏助赈：上海地区慈善义演的出现》，《音乐传播》2017 年第 2 期）。

2.在原因方面：第一，中国近代社会中的灾祸频发、近代城市兴起、中西慈善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等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国近代慈善义演活动的出现（胡娟：《中国近代慈善义演》，《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 年第 3 期）；第二，近代都市的兴起和娱乐业的发展为慈善义演提供了经济和社会基础。而华洋杂居口岸的都市繁华和“租界展示”，对慈善义演的出现产生了直接的促动作用。西方慈善理念的东渐和影响，成为慈善义演的思想引导（郭常英、岳鹏星：《寓善于乐：清末都市中的慈善义演》，《史学月刊》2015 年第 12 期）；第三，近代以来，都市经济生态环境的变动为慈善义演提供了经济基础，此外城市娱乐业的繁盛、近代义赈的兴起、西方慈善理念的注入都是晚清慈善义演产生的重要原因（岳鹏星：《晚清慈善义演发生动因》，《史学月刊》2018 年第 1 期）；第四，近代慈善义演兴起的原因，也呈现出地区性差异，1906 年的“国民捐”运动开启了京津地区演戏筹款的星星之火，期间戏曲改良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演戏活动的兴盛，而杭州“惠兴女士殉身办学”事件在京津地区产生较大的影响，由此改编的义务戏《惠兴女士传》在京津地区的接连上演标志着该地区慈善义演的正式发源（张秀丽、岳鹏星：《剧资兴学：清末京津地区慈善义演的发源》，《音乐传播》2017 年第 1 期）；第五，上海地区慈善义演的诞生离不开西方影响和有识之士的极力倡导。以《申报》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对演戏筹赈在上海的诞生起到了直接促进作用，新兴报刊与戏院之间的合力对于促动慈善义演的发生确实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李爱勇、岳鹏星：《演戏助赈：上海地区慈善义演的出现》，《音乐传播》2017 年第 2 期）。

3.在功能特点方面：第一，近代慈善义演主要有三大功能：赈助救灾、济贫救灾、爱国募捐（关心：《民国初年天津义演活动》，《大舞台》2013 年第 5 期）；第二，慈善义演活动具有参与群体多元化、慈善目的多样化的特点（刘怡然：《慈善表演/表演慈善：清末民初上海剧场义演与主流性实践》，《开放时代》2014 年第 4 期）；第三，寓善于乐是慈善义演得以存续的内生本源，娱乐与慈善事业的结合是慈善义演与其他助善方式最为显著的区别（岳鹏星、郭常英：《晚清都市空间中的慈善、娱乐和社群认同——以慈善义演为视点》，《广东社会科学》2017 年第 5 期）；第四，上海的演戏筹赈从最开始的报人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呼吁到戏园、艺人的单个实践，再到“助赈专场”的出现，呈现出一种实践化、规模化的特征（李爱勇、岳鹏星：《演戏助赈：上海地区慈善义演的出现》，《音乐传播》2017 年第 2 期）。

4.在作用影响方面：第一，慈善义演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生活，为时人提供了一个“公共社域”，提升了人们对公共事务与社会生活的参与意识，促进了时人向主流的思潮和话语靠拢的“主流性实践”（刘怡然：《慈善表演/表演慈善：清末民初上海剧场义演与主流性实践》，《开放时代》2014 年第 4 期）；第二，众多社会群体围绕慈善义演构成了一定的社群网络，又助推了慈善义演的兴起和繁荣。慈善义演的发展不仅折射出不同社群的身份认同，而且有利于不同社群的形象塑造（岳鹏星、郭常英：《晚清都市空间中的慈善、娱乐和社群认同——以慈善义演为视点》，《广东社会科学》2017 年第 5 期）；第三，义演构成的社会网络结构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成为慈善义演初兴的驱动力。慈善义演也促进了近代慈善事业的转型（郭常英、岳鹏星：《寓善于乐：清末都市中的慈善义演》，《史学月刊》2015 年第 12 期）。

现有慈善义演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拓荒不易，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应予基本肯定。我现就上述所涉及的问题和观点，谈谈我的看法。

1.关于慈善义演的概念和定位。上面谈到的关于慈善义演定义所概括的三种表述，即慈善义演是知识分子和慈善组织利用戏剧艺术的形式来进行公益募捐；通过演艺筹集资金用于社会慈善活动；为了慈善进行演出而不收取报酬这些都是言之成理的，不过我认为还不够完整全面，需要补充。我以为是否可以从这样三个方面予以表述：其一，慈善义演是为慈善募捐筹款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其二，慈善义演是近代出现的一种超越传统的慈善筹款的新形式；其三，慈善义演是近代演艺界人士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担当的一种行为表达。

2.关于慈善义演兴起的原因。上述谈到的关于慈善义演兴起原因所概括的五种表述，即近代社会中的灾祸频发与近代义赈的兴起、近代都市的繁华和娱乐业的发展、中西慈善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西方影响和有识之士的极力倡导、新兴报刊与戏院之间的合力促动等，已概括梳理得比较全面了，还需补充强调的是，不能忽略慈善义演的兴起，最主要的动因恐怕还应是基于近代演艺界人士想要通过这种方式用以改变自己。对此，郭常英教授已有探讨和分析（郭常英：《近代演艺传媒与慈善救助》，《史学月刊》2013 年第 3 期，第 21～22 页）。我们知道，演艺人士在传统中国被视为“戏子”，身份地位低下，进入近代之后，他们的主体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于是选择以慈善义演这种方式来改变自己，从而向世人展示和体现演艺界人士的一种社会责任担当，这与明清时期传统中国的商人为了改变其末商的地位而大力兴办善堂善会是一样的原因和道理。

3.关于慈善义演的功能与特点。前面谈到的功能与特点其中功能概括有三，即赈助救灾、济贫救灾、爱国募捐；特点概括有五，即参与群体多元化、慈善目的多样化、寓善于乐以及实践化、规模化。我认为讲慈善义演有这么多的功能和特点未免宽泛了。慈善义演的功能只有一项，那就是为慈善救助筹款，并非如同其他慈善组织一样行使多种功能。说其有那么多的特点，特点太多了也未免就是特点了，如果其他慈善组织机构都同样有的也就不成为特点，而必须是演艺机构独有的才算是特点，这个特点我觉得概括寓善于乐这一点也就够了。

4.关于慈善义演的作用和影响。前面概括了作用与影响的三种表述，即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生活，为时人提供了一个“公共社域”，提升了人们对公共事务与社会生活的参与意识，促进了时人向主流的思潮和话语靠拢的“主流性实践”；众多社会群体围绕慈善义演构成了一定的社群网络，又助推了慈善义演的兴起和繁荣，不仅折射出不同社群的身份认同，而且有利于不同社群的形象塑造；义演构成的社会网络结构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成为慈善义演初兴的驱动力。慈善义演也促进了近代慈善事业的转型。这些阐述可谓言之成理。但是如果转换一下视角，还可以从另外三个方面解读其作用和影响：一是面对慈善界，慈善义演这种为慈善筹款的新形式，诠释了出力和献艺都可以达到行善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目的，从而拓宽了行善的方式和路径，在慈善界令人耳目一新。二是面对从业界，慈善义演这种行为，可以为各行各业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既然演艺界可以找到慈善义演这样的行善方式，不同的行业就也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行善方式。三是面对社会大众，以义演这种方式助力慈善，把行善与劝善、形式与内容有机结合，其结果是弘扬了中华文化传统，营造了慈善文化氛围，淳化了崇德向善的社会习尚。

如何把慈善义演的研究在现有的基础上推向深入，我有两个方面的建议：

一、充分发掘慈善义演的史料。这次常英教授的重大课题名称是《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我想说的是珍稀与不珍稀的慈善义演资料都要充分地发掘整理与研究，因为也只有在全部发掘整理研究中，才能理出哪些是珍稀和哪些不是珍稀来。至于慈善义演的研究，就更加不能只限于珍稀的范围了。如何去发掘珍稀与不珍稀的文献资料呢？我觉得有四条重要的门径：

第一，档案的文献搜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各省、市的档案馆都可以去查。还有美国国家档案馆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中文资料。

第二，地方志的文献搜集。可以到国家方志馆以及各省、市的方志馆查阅收集。

第三，报刊文献搜集。可以主要到北京和上海两地的报库，逐一查阅几种大报，如上海《申报》、上海《时报》、上诲《时事新报》、上海《新闻报》、上海《民立报》、北京《晨报》、北京《益世报》、北京《正宗爱国报》、天津《大公报》、奉天《盛京时报》，等等。还有期刊如上海《东方杂志》、上海《永安月刊》、上海《妇女杂志》、上海《戏剧丛报》、上海《华侨杂志》、上海（天津）《国闻周报》、天津《春柳》、武昌《崇德公报》，等等（可参阅《中国近代期刊编目汇录》1～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四，各种图书文献搜集。可以到北京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全国各省的图书馆以及相关的大学图书馆去细致查找。

二、拓宽现有的研究范围。现有研究已经涉及了四个方面，即“慈善义演”的定义；慈善义演兴起的原因；慈善义演的功能；慈善义演的作用和影响。下一步应当围绕全国的慈善义演进行全面的构架和布局，把这个题目做实。

第一，慈善义演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兴起背景，主要是北京、上海、南京、天津、武汉、广州、沈阳等地，应当进行系统的梳理。其他各省的城市如果有这方面资料也要作相应的梳理。通过梳理阐述全国慈善义演出现的整体背景。说明以前为什么不出现慈善义演，为什么到了近代才有？其主客观条件何在，其内外动因有哪些，兴起的具体情形又是怎样？

第二，慈善义演的发展历程及其演化脉络。慈善义演在全国各地兴起之后，就会有发展、有变化，因此就要对其从晚清兴起以来到 1949 年以前的发展历程及其演化脉络进行系统的梳理。可以分阶段说明至少在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以及国民政府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变化的状况。

第三，慈善义演具体运行实施状况。如果说发展历程是纵向梳理，那么具体运行实施就是横向梳理。横向主要是梳理全国各地参与慈善义演社团组织机构先后各有哪些，各地各个时期在慈善义演的运营模式及其机制上有哪些？慈善义演的项目设计及其内容与形式又是如何？在慈善义演的实施各程中，各个地区各个时期先后所涌现出来的代表性团体机构和代表性人物又各有哪些？这些恐怕需要做一些个案的梳理和剖析才行。

第四，开展必要的比较研究。可以进行四种比较：一是中国慈善义演与外国慈善义演的比较；二是中国国内各地（城市）之间的慈善义演比较；三是慈善义演与慈善义展、慈善义卖这些类项相近的筹款模式比较；四是慈善义演与福利彩票、游艺竞技这些类项不同的筹款模式比较。

第五，慈善的绩效评估与坐标定位研究。这是慈善义演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即通过上述各种研究，对慈善义这种新事物和新形式在当时的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进行绩效评估，即它的出现对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如何对它作出中肯合理的评价，这是一方面；另一方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面，它毕竟是中国近代慈善领域的一种筹款创新模式和现象，那么它在中国近代慈善史上应当如何定位？又它也毕竟是一种中国近代的慈善文化现象，那么如何解读和阐释它在中国近代慈善文化中的内涵及其意义价值，等等。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203）课题组特约人员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18-03-06
作者周秋光，湖南师范大学中国慈善研究院教授。湖南，长沙，410006。

海派文化与近代上海年规义演

廖　大　伟

近代上海是座海纳百川的商业城市，八方移民来此谋生经商，甚至一些外国侨民也逐利而来，本地原住民较少。据统计，1885—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非上海籍人口比重大致为83%，1929—1936年上海华界非上海籍人口比重大致为73%（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为了更好地发展，商人们往往结成地域性行业性的互助互利团体，建造会馆公所作为本帮大本营。而这些商帮，常常组织义演，搞公益活动，以至于在沪各籍商帮竞相组织年规义演，由此构成近代上海延续多年的一道风景。

年规义演，一般由各商帮同业公所出资延请戏班演剧献艺。乾（隆）嘉（庆）以降，已形成不成文规定，即每年新春伊始，由各商帮同业公所轮流出资延请戏班在上海南市邑庙戏台，也即现在的豫园西园戏台进行演剧，时人称正月初一至初十新春所演之剧为“春台戏”，正月十三至十八所演之剧为“灯头戏”，而将此相沿成习并已固定化的新春演剧活动称之为“唱年规戏”，因为是面向公众的公益性演出，所以叫做年规义演。年规义演不仅演剧，还有一系列其他活动，通常会有人先于宽街闹市舞阵狮子舞番龙灯，然后再到戏台或者特定地方开锣演剧（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上海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705页）。

由于上海移民云集，商帮众多，所以有移民特色和商业气息的同业公所也特别多。仅豫园一处，就一度有21个同业公所（熊月之等主编：《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76页），如今保存完好的点春堂，曾是闽商糖、海味业和棉花三业的同乡公所（《上海市海味杂货商业同业公会》，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S349-1-1）。有的同业公所自己出资延请戏班演戏。道光年间，上海人张春华有诗曰：“豫园晴午景轩眉，同上春台次第窥，相约破工夫早到，庙台日日有年规”（《沪城岁事衢歌》，张春华等著，许敏、吕素勤标点：《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1929年，上海的戏院不过20余家（《上海全市公私立娱乐场所统计表》，上海市地方协会1933年编：《上海市统计》），所以晚清民初，戏曲演出一般都在“茶园”“茶楼”、寺庙、会馆等。上海的会馆公所建筑多设有神殿，以供奉乡宗业祖。殿宇前多建有戏楼或打唱台，如钱业公所有财神殿打唱台、梨园公所有老郎庙戏台、商船会馆有天后圣母殿大戏楼、三山会馆也建有形制精美的戏台。近代上海规模较大的会馆公所基本上都有戏台，如四明公所、潮州会馆、广肇公所、泉漳会馆、商船会馆，等等。每逢行业性庆典、神灵诞辰、祖师爷神诞或乡土节日、年令节庆，这些会馆公所都要延请戏班举行酬神演出和聚会助兴演剧活动，如清明节、中元节、天妃诞日等，各会馆公所必延班唱戏，一为公祭乡宗业祖，二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